

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主 编 曾业英

副主编 黄春生 徐秀丽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 曾业英主编. —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4
ISBN 7-80622-797-0

I . 五... II . 曾... III . 中国—近代史—研究
IV . K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0)第16404号

责任编辑: 陆坚心

封面装帧: 程 钢

技术编辑: 张伟群

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曾业英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福州路424号 邮编200001)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展望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23.25 字数581千字

2000年4月第1版 200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80622-797-0/K·171

定价: 50.00元

专家推荐意见

本书对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了全面的回顾和总结,每一个研究领域都结合时段和专题,梳理了研究成果,肯定了成功经验,同时也剖析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对今后的研究发展进行了展望。涵盖面广,信息量大,概述和分析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性,既是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者(特别是初学者)必备的参考书,也是广大读者了解中国近代史研究历史和现状的窗口。

——张振鹞(研究员)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经历过许多曲折,成就与问题、经验与教训并存,如何正确加以总结,是今后进一步将有关研究推向新高度的必要条件。本书编者恰当地选择了二十多个专题,邀请有关的专家执笔,对各领域的研究状况进行回顾和总结,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全书设计合理,概括全面、准确,叙述清晰,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杨天石(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评审意见

本书全面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各个方面的状况,实事求是地概述了这一时段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大势、进程特点、重要成果、成败得失,对于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研究趋向、深化研究的途径和方法提出了颇具价值的评论和意见。它的出版,无疑有助于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目 录

前 言	曾业英	1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张海鹏	1
晚清政治史	姜 涛	19
民国政治史	汪朝光	44
经济史	虞和平	81
军事史	茅海建	刘 统 117
思想史	龚书铎	董贵成 133
文化史	刘志琴	156
史学史	胡逢祥	191
教育史	王炳照	232
中外关系史	王建朗	郦永庆 250
社会史	蔡少卿	李良玉 285
城市史	何一民	306
工人运动史	刘晶芳	346
妇女史	郑永福	吕美颐 382
青年运动史	李玉琦	429
太平天国运动史	夏春涛	454
孙中山研究	王 杰	494

辛亥革命史	章开沅	530
北洋军阀史	来新夏	莫建来 552
中共党史	杨奎松	582
抗日战争史	荣维木	613
近代历史人物研究	马 勇	659
近代史资料的整理与出版	庄建平	684 ✓
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	雷 颐	717 ✓
作者简介		731

前 言

今年10月1日,是我们伟大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大庆的日子。在过去的50年里,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无论是质与量,还是方法与史料,都大大超越了前人,为中国史学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为此,我们编辑出版了这本《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专书,一方面作为我们对这一光辉节日的特别献礼,另一方面也藉此对新中国5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成就和经验,从学术史的角度作一回顾和展望,以使即将到来的新世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有所借鉴和参照。

我国是个学术昌明的文明古国,我们的学术前辈向来很重视学术史研究。自明末清初的黄宗羲撰成首部学术史专著《明儒学案》以来,又有黄宗羲、全祖望等人所撰《宋元学案》,江藩所撰《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梁启超所撰《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即《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及钱穆所撰同名专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众多学术史著作问世。但因种种不言而喻的原因,尽管时下也不乏有识之士大声疾呼要重视学术史研究,却总有那么一些研究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前辈学者这一宝贵学术传统。他们研究问题,发表论文,出版专著,从不考察前辈学者对其研究对象有无研究,或研究到什么程度,只是一味“跟着感觉走”,自我陶醉在众所周知的陈词滥调和“老子天下第一”的狂妄无知之中,从而大大影响了他们的研究成果的学术水

平。这正是我们编辑出版《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一书的重要原因。我们希望通过此举,能在避免或减少中国近代史研究者的暗中摸索工夫方面略尽绵薄之力,让研究后学尽快了解和掌握前辈学者的理路和方法,稳步而坚定地走上学术研究的正路,守其所当守,弃其所当弃,补偏救弊,推陈出新,在未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50 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题材广泛,内容丰富,难以一一总结和介绍。我们仅依据多数学者专家的意见,选择理论和方法、晚清政治史、民国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思想史、文化史、中外关系史、社会史、城市史、太平天国运动史、孙中山研究、中共党史、近代历史人物研究等 24 个有代表性的专题,作为本书总结和介绍的对象,其他不少取得骄人研究成就的专题,因篇幅关系只好忍痛割爱了。所组各稿大多依时间顺序,分阶段概述了 50 年来该专题研究的主要进展、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回顾全面,评论独到,充满智慧,富有启迪,为新世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创新工程奠定了扎实的根基。

本书得以顺利出版,首先要感谢的是各位百忙中分身撰稿的学者专家,其次是默默无闻地承担起了繁琐的全部编校任务的曾学白、谢维、杜继东、王立新等女士和先生,再次就是对学术事业富有远见的上海书店及其总编辑金良年先生,没有他们的全力支持,我们的愿望是难以如期实现的。遗憾的是由于我们学识有限,加上时间匆促,不尽如人意或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尚祈海内外学者专家不吝批评指正。

曾业英,于 1999 年国庆节前夕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对于具有悠久历史和传统的中国历史学来说,中国近代史研究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从严格意义来说,它从形成迄今大约不到一个世纪。1949年以前,为国民党专制统治服务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意识形态,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可视为这方面的代表作。少数共产党员和非党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服务、推进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需要出发,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观察、研究中国近代史,在那时的时代条件下,这样的观察和研究对于挑战那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范文澜在延安写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胡绳在香港出版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就属于这方面的代表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中国共产党成了执政党,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新的国家形式。对于中国历史的这一巨大变化,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欢欣鼓舞,他们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建设新中国的历史潮流中去。中国学术界要讴歌这一巨大历史进步,要探索这一历史进步之所由来,在新中国的学术园地里,中国近代史学科空前地发展、成长起来。较之1949年以前,中国近代史研究有了很大前进,无论是研究机构、研究队伍、研究成果,以及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与往昔不能相比的发展。但是,我认

为,最重要的进步是在历史观方面,是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概括起来说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建立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积极开展百家争鸣,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1954年,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胡绳发表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引起了近代史学者的强烈关注和热烈讨论。1957年,《历史研究》编辑部汇集了三年来学者的讨论文章予以出版。这是中国近代史学界学习唯物史观、寻求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建立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宝贵纪录。中国近代史如何分期,看起来是编写近代史教科书的一个具体问题,但是依据什么标准分期,却涉及历史观问题,涉及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理论与方法问题,涉及叙述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以什么来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胡绳有感于1949年以前的有些中国近代史教科书按照“道光时代”、“咸丰时代”、“同治时代”,或者按照“积弱时期”、“变政时期”、“共和时期”来叙述历史,认为这是不足道的、不足取的,因为它“没有反映出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本质的东西”;^①另一些教科书,甚至包括“一些企图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来说明历史的书”在内,则放弃了历史分期的办法,按重大事件来叙述历史,叙事时大致上采用了纪事本末体的方法,这种方法,往往“拆散了许多本来是互相关联的历史现象,并使历史发展中的基本线索模糊不清”。^②在讨论分期标准的时候,胡绳批评了

① 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页。这里胡绳指的是李泰棻《新著中国近百年史》(1924年版)、孟世杰《中国最近世史》(1926年版)。

② 《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2页。胡绳所指一些企图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来说明历史的书,是华岗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1951年增订版)、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上编第1分册(1947年版)。

那种拿帝国主义侵略形态作划分时期标准的看法,认为“只看到侵略的那一面,而看不到或不重视对侵略的反应这一面,正是历来资产阶级观点的近代史著作中的主要缺点之一”;^①同时也批评了单纯用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来作划分时期标准的做法,认为那样会走到经济唯物论的立场上去,对中国近代史分期,必须全面考察当时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的变化并不是亦步亦趋地随着基础的变化而变化。胡绳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依据毛泽东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论断,提出了“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准”的重要意见。他还特别指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要求不是在于给各个事变、各个人物一一简单地标上这个阶级或那个阶级、进步或革命的符号。如果在一本近代史著作中不过是复述资产阶级观点的材料,此外只是多了这一些符号,那并非是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任务。“要使历史研究真正渗透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就要善于通过经济、政治和文化现象而表明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社会力量的面貌和实质,它们的来历,它们的相互关系和相互斗争,它们的发展趋势”。^②应该说,这是第一次向学术界提出了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任务,从学术上提出了要使历史研究真正渗透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的重要观点。依据这种观点,胡绳还提出了“中国近代史中的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此后史学界一般称“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并对1840年至1919年的中国近代史分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胡文发表后,引起学术界热烈反应。1957年新华社发布《中国近代史分期讨论告一段落》的消息,披露截止当时共有24篇相关论文发表。三年间,先后有孙守任、黄一良、金冲及、范文澜、戴逸、

① 《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间题讨论集》,第4页。

② 《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间题讨论集》,第7页。

荣孟源、李新、来新夏、王仁忱、章开沅等发表讨论文章，阐明自己的观点。报纸还报道了天津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中国人民大学第六次科学讨论会以及综合大学文史教学大纲讨论会上有关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的意见。许多人同意或基本同意胡绳有关分期标准的见解，同时也提出了若干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应以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发展及其质的某些变化为标准；^① 有人主张，“必须严格地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树立以中国人民为中国历史主角的思想”；^② 有人认为，“分期标准应该是将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表征和阶级斗争的表征结合起来”；^③ 有人认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经济政治压迫和中国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成为贯穿这一历史时期的根本矛盾，也就成为贯穿各个事件的一条线索”^④ 等等。因为对分期标准的认识不同，或者虽然相同但理解不一定相同，因而形成了对中国近代史分期的种种不同主张。

评价这一次讨论，我认为，不在于对分期标准的认识是否统一，不在于对具体的历史分期研究取得了多少进展，而在于这是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近代史学界(不仅限于中国近代史学界)结合研究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历史唯物主义，消除旧中国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史学观的一次重要机会。通过这次讨论，明确了研究中国近代史，必须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许多讨论者几乎一致认为，毛泽东所

① 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15页。

② 黄一良：《评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一文》，《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43页。

③ 金冲及：《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45页。

④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98页。

说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原则上表述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因此,应当考虑以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运动及其发展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

与此同时,史学界还开展了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中国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讨论、中国土地制度问题讨论、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等等,所有这些讨论,是发生在 50 年代的一次马克思主义大学习,是一次不可多得的百家争鸣,它推动了史学界形成学习理论特别是学习唯物史观的浓厚风气,使一大批来自旧中国的学者以及刚刚成长起来进入史学战线的青年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运用唯物史观观察和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对中国近代史的观察和研究,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设,推进了中国近代史领域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和历史实际问题的研究。过了 40 多年,今天来回顾这次讨论,我们仍然感到,中国近代史学科所以有今天这样的局面,我国近代史研究学者所以有今天这样的思想水平,是如何受惠于 50 年代的那次讨论的。

经过 50 年代的讨论以后,近代史学界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科学性和革命性问题、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问题,大体取得了共识。此后出版的三本中国近代史课本,体现了这次讨论的结果。其中两本是 1962 年出版的:一本是郭沫若主编、刘大年组织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编写的《中国史稿》第 4 册,一本是翦伯赞主编、邵循正和陈庆华编写的《中国史纲要》第 4 册。第三本是胡绳编著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此书虽然出版于 1981 年,反映的仍是那次讨论的结果。前两本书是为大学历史系编写的教材,后一本是为广大干部编写的近代史读本。

以前讲中国近代史的书,包括拥有众多读者的范文澜著《中国

高世

近代史》，一般带有纪事本末体的特点，而且内容偏重于政治史。这在当时是有道理的，但是需要改进。《中国史稿》第4册的作者们努力作了改变。依照《中国史稿》第4册主持人刘大年的看法，1840年至1919年近代中国80年的历史，明显地表现为鸦片战争至太平天国失败、1864年至戊戌变法与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及1901年至“五四”运动爆发的三个不同时期。在那几个时期里，帝国主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相互关系、各种势力的矛盾斗争各有特点。其中社会经济状况、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是结合在一起的，统一的。因此，新的著作要求根据历史演变的时间顺序讲述事件，不只讲政治事件，也要讲经济基础、意识形态；不只讲汉族地区的历史，也要讲国内各民族在斗争中与全国的联系和相互关系。《中国史稿》第4册这种写法，就是总结了1949年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理论建树和研究成果，加以概括和升华，给中国近代史搭起了一个新的架子，有些地方做出了可喜的概括。当时它是指定的高等学校教材，印数很多。1982年全国近代史专家在承德举行学术讨论会，有的研究者评论说，60年代最有影响的近代史著作是郭沫若主编、实际上是刘大年写的《中国史稿》第4册。这个评论指出了那本书在一段时间里流行的情形。胡绳的著作，规模较大，条分缕析，议论恢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刻意追求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对教学和研究工作以及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上三本书，尽管在某些具体问题的论述上学者们可能有不同意见，但是它们基本上确定了中国近代史教科书的编写体例和框架，确认了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考察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确认了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确认了近代中国的基本任务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具体编写上大体接受了三个革命高潮的概念。80年代中期以来出版的数以百计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和普及读物，大体上都是按照这个框架编写的，可以看作是学者

们接受这个框架的标志。

从1980年起,中国近代史学界再次掀起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讨论。经过十年动乱,一些学者从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出发,要求抛弃极左的政治枷锁和教条主义的绳索,要求纠正由于党的指导方针上的失误在史学研究中出现的片面化、简单化的倾向,反思近代史研究的基本状况,对早先胡绳提出并得到相当多学者支持的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作划分时期的标志以及三个革命高潮的概念,提出了怀疑和驳难。李时岳首先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发表了题为《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的论文,引起了有关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新一轮讨论。这次讨论中也涉及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却不像50年代的讨论那样,使近代史基本线索这样一个重大理论问题附丽于分期问题上,而是直接提出了问题。

李时岳的文章发表后,在80年代中期形成了争鸣的热潮,直到90年代还有文章发表。与50年代的那次讨论比较,这次讨论,问题提得更广泛了,角度更新了,研究更深入了,分歧也更显著了。概括说起来,大体有三种主要观点。一派以李时岳为代表。李时岳提出,“1840—1919年的中国近代史,经历了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四个阶段”,“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①认为要重视近代史上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发展的意义,给予资产阶级政治运动以应有的政治地位,^②强调要以“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进步潮流或基本线索。一些学者把这种提法概括为“三个阶梯”论,李时岳本人认为不确切,曾著文修正说,应当包括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而

① 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② 李时岳:《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

称之为“四个阶梯”论。此论的依据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上存在着两个而不是一个趋向:一是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的趋向,一是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趋向。前者是个向下沉沦的趋向,后者是个向上发展的趋向。李时岳表示赞成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作为线索,认为“四个阶梯”论与“三次高潮”论并非根本对立,只是部分地修正和补充,“三次高潮”论的不完善的地方“在于没有把阶级斗争和社会经济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没有把唯物史观贯彻到底”。^① 在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讨论中,有的学者认为,说毛泽东的“两个过程”论没有概述中国近代史的“全部内容”,是对毛泽东本人原意的“误解”,要求“摆脱”“两个过程”论的“束缚”,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悟出一些新的道理,把我们的研究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② 有的认为,中国近代社会“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始终是历史的主题;而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则是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③ 或者说,近代“中国人民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谋求社会进步(发展资本主义)两项根本任务。这两项任务贯串着整个中国近代史,一切斗争,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的斗争在内,都是围绕着这两项根本任务进行的。它们构成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④ 依据这

① 李时岳:《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

② 胡滨:《打破框框,开阔视野》,见《文史哲》1983年第3期“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笔谈)”专栏。

③ 据《历史研究》编辑部近现代史编辑室《国内史学界关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历史研究》1983年第4期。该项资料注明这段文字出自1981年3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李时岳、胡滨著《论洋务运动》一文。经查上述资料所引述的这段文字,与原文有出入,但并不违背作者的本意,或者可以看作是对作者本意的一种概括。

④ 胡滨:《打破框框,开阔视野》,《文史哲》1983年第3期。

种理解,他们以资本主义运动(包括经济和政治两方面)作为主要线索来考察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认为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① 他们认为,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要争取民族独立和谋求社会进步,就必须向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况,实现中国的近代化。

另一派大体上坚持胡绳原先提出的观点。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的序言和1997年再版序言以及其他文章中,仍坚持三次革命高潮的观点,认为前一派的想法抹煞了农民革命在近代中国历史中的作用。苏双碧、^② 苑书义、^③ 张海鹏、^④ 荣孟源、^⑤ 等也先后发表争鸣文章,认为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线索应制约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中国人民的中心任务是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其中也包括建立自己的民族工业,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个过程就构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他们认为,毛泽东关于中国近代史所说的“两个过程”正确地概括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不同意把“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当作“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认为中国只有通过民主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才能发展资本主义。与前一派意见相比较,这一派意见不同意简单地把洋务运动当成进步运动,也不赞成把义和团运动列在基本线索之外。

第三派意见比较复杂,基本上依违于以上两种意见之间,或者另有生发。章开沅发表《民族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⑥ —

① 李时岳:《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

② 苏双碧:《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线索问题》,1983年11月9日《光明日报》。

③ 苑书义:《论近代中国的进步潮流》,《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2期。

④ 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

⑤ 荣孟源:《谈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历史教学》1984年第7期。

⑥ 《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

文,试图从民族运动的角度来阐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他认为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民族运动的发端。他把近 80 年的近代中国历史以 1900 年为界标,概括为“两个阶段,三次高涨”,即:第一阶段经历了太平天国和甲午战后的戊戌维新、义和团两次民族运动的高涨,第二阶段经历了辛亥革命这次更具有近代特征的民族运动的高涨。他说,民族运动的这三次高涨,是近代中国历史客观存在的发展态势,体现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和发展规律。章开沅认为,“洋务—维新—革命”只是一个简单的框架,它特别容易使人忽略农民和土地问题这样重要的社会内容。因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能机械搬用近代史即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衰败的历史之类现成公式。他又认为“三次革命高潮”一词还是不用为好,因为“革命”一词有广狭两种理解,说三次革命高潮不仅容易引起概念理解上的歧义,而且容易使人联想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提法,使作为整个中国近代史组成部分的新、旧民主主义史缺乏体例上的协调。他又特别指出,毛泽东说的“两个过程”可以作为我们据以探究近代中国历史基本线索的基点。说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过程是一种民族运动,并不意味着以另一条线索取代“两个过程”而作为基本线索。“两个过程”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是中国近代史全过程的主干,因而也就理所当然地被人们理解为贯穿始终的基本线索。由此看来,这第三派虽然对前两派都有所批评,其主张的实质与胡绳的意见是较为接近的。

戚其章持另外一种看法。他认为,说“两个过程”就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是难以成立的。他认为,考虑基本线索时不宜空泛地谈论“阶级斗争的表现”,反帝斗争固然不能体现基本线索,就是反封建斗争也不一定每次都能体现基本线索,“基本线索的标志,应该是能够反映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前景的国内阶级斗争”,“只有推动社会变革的国内阶级斗争才能体现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他提出,在中国近代史上,只有太平天国、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才能